

品鉴坊

《鱼和它的自行车》：
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阅读提示

鱼究竟是否需要自行车?《鱼和它的自行车》的作者陈丹燕认为:对生活的激情,对过一种不平凡生活的要求,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这些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鱼和自行车的关系。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条鱼,还有一辆自行车。

陈丹燕

■ 吴政

小说的第一章《标本》,陈丹燕强调的细节是护士学校人手一个的那只装菜的瓶子,“他面前也有一只玻璃瓶,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小菜,大约是素什锦之类。”

小说的第二章《果珍》,陈丹燕强调的细节是一瓶果珍,“路过银杏树时,我把瓶子举在手里看看,真漂亮!真温柔!忍不住旋开瓶盖,捅破封瓶纸,瓶里扬起一些橘黄色的粉末,立刻闻到鲜橘子的清新气味……”

小说的第三章《车铃》,陈丹燕强调的细节是:“回上海的火车要花好几天时间。火车上很脏,很热,茶杯上要是盖不上盖子,开水上面就会飘一层黑色的小灰尘。”

这些细节告诉我们,《鱼和它的自行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

其实,小说的起始句就已经告诉读者,“那是八十年代初夏的一个黄昏。”

我的大学生活

2002年,我第一遍读陈丹燕的长篇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查阅过读书笔记后,发现当初最刺激我的是小说的书名《鱼和它的自行车》。而印在封底上的文字告诉我,陈丹燕借用的是1970年代在西方风靡一时的口号“一个女人并不需要男人,就像一条鱼不需要自行车”。那一版的封底还告诉我,过了20年,诞生这句著名口号的柏林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店名就叫“鱼在找它的自行车”——我得承认,第一次遇到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时,是印在封底上的这些元素,让我急切地想从小说的女主角王朵莱身上,寻找我已经逝去的大学时光。



隐而不宣地在彼此鼓励,我们是不需要自行车的鱼。

然而,同一寝室的我们8个女生,或毕业前或毕业后都无一例外地被爱情俘获,并先后结婚生子。

鱼在找它的自行车

那么,陈丹燕的王朵莱是否与我们背道而驰做了一条不需要自行车的鱼?不。王朵莱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辆自行车。作者陈丹燕在这部爱情小说中用三个章节讲述的王朵莱的4段爱情,是更贴近现实的一个女人竭尽全力要兑现想象中的爱情的艰难过程。

还是护士学校学生的17岁的王朵莱,以为长着“拥有成熟故事又有青春余温的脸”的英语老师,就是自己寻找的自行车,然而,坐在学校食堂餐桌旁的英语老师,“面前也有一只玻璃瓶,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小菜,大约是素什锦之类”,这一细节击碎了王朵莱画在英语老师与她的“自行车”之间的等号。

那么,刘岛呢?遇见刘岛时,王朵莱已到病房房实习,刘岛就是住在病房里的白血病患者,“刘岛望了我一眼,温顺里有一种我看到的渴望,也许是一个重病人对护士的依赖,也许是一个生病男人对健康女孩的爱慕”,默念此话的王朵莱离20岁还差2个月,异常清醒中想要寻找那辆自行车的她还是被刘岛的温顺一望俘获了。然而,一场滑稽戏的邀约帮助王朵莱意识到,带着同情的眼光看到的自行车,它已不是原本的模样。

两场断送了王朵莱护士职业生涯的短暂恋情,在医学院研究员魏松眼里,非但不

是王朵莱的瑕疵,而是一个女孩有些特别的标签。明知道魏松并非自己满意的那辆自行车,王朵莱还是与之走进了婚姻。有了女儿后两个人的感情进入了倦怠期,可吐鲁番的维吾尔族汉子沙沙比火焰山温度还高的追求,却不能动摇王朵莱回上海回到魏松和女儿身边的决心。

“少女时代,我是个多么渴望爱情的人啊,我多么渴望惊天动地的爱情啊,我已为了这个惊天动地,被惩罚得天崩地裂,五马分尸”,这样的结尾部分,在2002年读得我肝肠寸断。我,以及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学校教育的女孩,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自行车的过程中,一定不会像陈丹燕艺术加工过的王朵莱那样奋不顾身,然而,王朵莱的极端做法却真实地再现了我们这一代女性因为经历了爱情和婚姻而得以重生的艰难过程。所以,当新一轮的《鱼和它的自行车》在握,我不禁担忧:似乎又进入了鱼不需要自行车的年代,当下的年轻人会喜欢勇往直前寻找自行车的王朵莱吗?

“王朵莱”存在于每个年代

在2023年版的《鱼和它的自行车》另册里,摄影师丁晓文用图片记录了陈丹燕与王朵莱的一次见面。

当然不是《鱼和它的自行车》里的王朵莱走出了小说,而是一个名叫吴小初的读者狂热地爱上陈丹燕的这本小说后将自己的网名改成了王朵莱。在丁晓文的镜头前,陈丹燕和“王朵莱”于2016年夏天的那一次见面,用在另册里插嘴的责任编辑李伟长的话来定义,就是陈丹燕幸福地见证了她的小说塑造了一个女孩的生活。相比李伟长的定义,我更关心的是“王朵莱”是否是我的同龄人。于是,在另册的枝枝蔓蔓里寻找——她也是在2002年读到《鱼和它的自行车》的,只是,那一年她14岁,我已过而立。

所以,陈丹燕不会惧怕她在小说里强调的那些细节,会因为凸显王朵莱生活的年代而削弱作品的接受广度。她自信,她这本小说讨论的话题具备长时段的社会意义。这不,上海文艺出版社选择今年重版了《鱼和它的自行车》。

阅读提示

年轻人应如何理解爱情,经营婚姻,如何面对诱惑与考验,又如何从迷失中清醒,如何透过被打碎的生活看到重建的希望?《你好,朋友圈》以当代信息社会为时代背景,讲述都市男女坎坷曲折的爱情故事。本书

作者王洁倾情分享创作感悟,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信息社会下网络与爱情、婚姻、生活之间的联系。



王洁



■ 王洁

在时间流速越来越快,社交媒体越来越便捷的今天,情感的保质期,难免“彩云易散,琉璃脆”。《你好,朋友圈》的故事就是从“李淑娟”的婚姻事变开始的。

话题:朋友圈里的爱恨别离

当“信息”的获得成本降级时,似乎爱情也开始降格。

贺国璋与李淑娟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来到李淑娟上中学的滨海生活。贺国璋从事企业文化培训工作,事业小有成就,在微信群里有很多粉丝。李淑娟则是在一家企业做文员,过着朝九晚五工作单调的无聊生活。快节奏生活把两人原有的浪漫情调彻底打乱了,交流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各自与手机、微信、QQ等社交工具为伴。

朋友圈,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好场所!但很不幸,女主人公李淑娟成了这里的牺牲品。

没过多久,打入贺国璋微信群的闺蜜谢冰冰,就给李淑娟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有个叫杨季兰的女孩与贺国璋在朋友圈互动较多……

李淑娟的婚姻,随即破碎。

文学作品,是对时代的敏感洞见。朋友圈里的爱恨别离,是作家绕不开的话题。

我亦不能免俗被信息革命的洪流推着向前,有时深感畏惧——那黑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信息,拍打着我们弱小的船儿。

“眼”的功能被不断涌现的新媒体延伸千里,心的归途,难免万里奔赴。

觉醒:生活不总是“曲误郎顾”

离婚后,李淑娟希望自己早点实现财务自由,过上更为独立的生活,于是就和根本没有社会能力的闺蜜谢冰冰合资,开了一家咖啡馆,从“男人身后的女人”转为“面向女人的女人”。

有些女性在受到情感伤害后就会转向事业。就像甄瓊在甘露寺最后的发愿,决心改变自己,抛却花前月下的幻想,最终凤凰还巢。

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后,李淑娟的咖啡厅终于开起来了,但生意却远远达不到预期,开业即陷入亏本的状态。

这其实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即使是女性作家,也无法以文字的圆满,随意更改这风雪兼程。

记得前两天有个朋友说:女性力量,正在迅速崛起。

可是崛起的标准是什么?从何崛起?它的标配,并不是随便便能在朋友圈晒几个自己的名牌包包,社交媒体上立起前呼后拥出行的飒姐,线上课程里的美商导师……或是躺在意大利真皮的沙发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优雅缓慢地望眼,吐气幽兰:我离过婚……再直播一个市场需要的励志故事。

这只是“营销”的工具,不是真正的自我苏醒。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资本的羔羊。在此,我想不必赘述血淋淋的教训,以及那些堕入奇奇怪怪的朋友圈商业模式的“情伤”女性。

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平凡的女子,没有拿甄瓊的剧本。不是经历错过的人,就会遇到对的人。不是情感失败后,就能迎来事业成功。

咖啡馆失败后,李淑娟遇到了另一个男人林绍峰。但林绍峰是个花花公子。

情感的二次暴击下,此刻的她,要怎么去面对呢?信息爆炸引来思潮碰撞,女性驶入一个新时空领域。其实,选择和谁结婚,是不是离婚,甚至选择不婚,都只是人生“程序”性的东西,真正的“源代码”,是对于“内我”阵地的坚守。

我直至书写完,也无法给李淑娟一个圆满的婚姻交代。“她”成长得比我快,她已经参悟幸福的本身是“稚子之心”,仗剑归来仍少年,像没有经历离婚一样敬爱,像没有受伤一样拥抱着。

我直至书写完,也无法给李淑娟一个圆满的婚姻交代。“她”成长得比我快,她已经参悟幸福的本身是“稚子之心”,仗剑归来仍少年,像没有经历离婚一样敬爱,像没有受伤一样拥抱着。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怀稚子之心
享自在生活

《你好,朋友圈》创作感悟

新书馆

医事法的核心:医患之间如何博弈平衡

——评牛津大学赫林教授新著《医事法与伦理》

阅读提示

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健康又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患者也有重要的权益,他们对他们的治疗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医患之间的博弈平衡成为今天医事法的一个核心主题。《医事法与伦理》作为牛津大学法学专业学生选修《医事法》课程的教材,为医学与法学的跨学科领域教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

■ 石雷

近些年,我国基本建成了健康促进制度体系,健全完善了健康保障体系,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涉医纠纷仍偶有发生。虽然此类纠纷数量较少,但易诱发暴力伤医事件,进而阻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健康中国建设需要法治支持。未来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我国医事法应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提供怎样的制度供给,如何应对医学前沿科技等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牛津大学赫林教授的《医事法与伦理》一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全景式地展现了英国法如何应对医疗问题,可为我国医学与法学的对话提供启示。

调整医患关系的英国做法

当下,英国正在经历重大社会变革。一方面,英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也促使医患关系发生转变。现在,英国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在不断增加,赫林指出“患者可以轻松通过网络获取医疗保健信息。用于检测疾病的家用设备,跟踪个人健康的穿戴设备,检测个人基因的网站也已经出现……所有这些变化对调整医事法的法律及伦理方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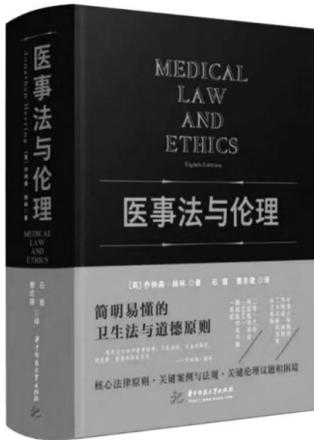
为此,《医事法与伦理》一书围绕医事法中的部分重要议题做了详细探讨,包括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及卫生资源配

给、医疗过失、知情同意权、精神卫生法、保密义务、器官捐献、人工辅助生殖和医生协助死亡等。作者以通俗、精练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各重要议题的基本法律规则、重点案例、学界主要争点等。在生育及女性相关议题部分,该书还补充了女性主义的部分观点,帮助读者认识了解女性主义的立场和主张。

患者自主权和自主原则

如果只用一个主题来概述本书的话,可能没有比“患者自主权和自主原则”更恰如其分了。从法学的角度看,医事法的诸多议题都离不开患者自主权这一主题。从医学伦理学上看,这恰恰就是医学伦理学强调的自主原则(也被称为尊重原则)。该原则强调医师尊重患者的自主性,保证患者可以自主、理性地选择诊疗方案。从法技术角度看,患者自主权作为人格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知情同意权的法理基础。患者自主权的概念界定将直接影响知情同意权的权利范围,而后者又是判定医方存在医疗过失、构成医疗侵权的标准。作为医事法的核心议题之一,英国近些年涉医疗侵权的部分重点案例始终围绕患者自主权展开。

长期以来,英国医事法上认定医疗过失的重要标准是1957年确立的“博勒姆标准”,即同领域的专家是否赞同涉案医生的治疗行为。只要有专家支持,即使不同专家对同一问题存有争议,法院也不会就此认定



医生的做法存在过失。简言之,博勒姆标准本质上以医方的专家意见作为是否侵犯患者自主权的判定依据。而蒙特哥马利案则在一定程度改写了英国的医疗过失规则。该案中,糖尿病患者蒙特哥马利女士在孕晚期时出现了并发症,后在自然生产时不幸遭遇肩难产,其儿子因此出现残疾。蒙女士认为医方事先未告知像她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如选择顺产有可能发生9%—10%概率的肩难产以及她可以另行选择剖宫产,由此认为医方侵犯了她的自主权,应为此承担损害赔偿。蒙女士的诉讼请求最终得到了法官的支持。该案确立的规则是,即使风险很小,医生也有义务向患者告知自然生产的可能风险以及替代治疗措施。这一规则强调了对患者自主权的保护。

申言之,在判定医方是否存在过失侵权的问题上,英国医事法正在由医方标准向患者标准发生位移。医生的职责是和患者一起“共同”找出患者罹患疾病的诊疗方案,而非以家长主义的方式代替病人决定。这一“共同决策”新模式更大程度保护了患者的自主权,也得到了法律更大程度的重视。

自主权和公共利益

虽然新标准强化了对患者自主权的保护,但值得思考的是英国医事法未来是否完全或在多大程度上抛弃医方标准?这一问题背后实则关乎患者自主权的边界。

对自主权予以限制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保护公共利益。英国医事法之所以采用博勒姆标准认定医疗侵权,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更好借助专家智识帮助判断涉案医生是否侵权。因为一般法官没有能力判断医生的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采用博勒姆标准也能更好维护医方的合法权益,保护医学创新研究,防止患者因遭遇不良反应就径直选择诉讼导致的滥诉危机,进而保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尽管英国法通过建立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尽最大可能消解医疗行为与医方逐利的正关联,但当下发达的网络科技极大提高了健康信息的可及性。这让民众对博勒姆标准设立的医方标准提出了质疑。在博勒姆标准下,患者几乎无法完成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虽然患方标准能更充分保护患者自主权,但这一标准又会带来如何认定患者具有自主权的疑问,尤其是患者的决定在常人看来不那么合理时。如采用患者标准降低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又可能引发医方对医疗侵权的担心,增加医方的防御性治疗行为,阻碍医疗创新。这真的符合公共利益吗?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公共利益应包括哪些内容?在以公共利益为由限制患者自主权时,限制的范围和程度又应如何设置?这些问题既是英国的问题,在我国同样存在。

实际上,在思考这些涉医疑难时,我们无法绕开一个根本问题:医疗环境中的个体往往更脆弱,尤其是婴幼儿、孕产妇以及失智失能老人,他们更需要关怀和照顾。而这种关怀和照顾关系是强调效率的合同法等无暇顾及的问题。关怀和照顾通常不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这恰恰提醒我们,法律应如何保护我们珍视的各种关系?也许《医事法与伦理》一书会让我们的这些疑问变得更加清晰。